

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文风

赫丽娜 苏显信

文风是一种反映社会风貌的文化现象,它具有普遍性、倾向性和敏感性。一定的时代精神,人们的观点立场、思想作风、思想方法等常常敏捷地在文风中表现出来。

在现代信息传播迅速而广泛的今天,对于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思想理论以及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出版宣传各界来说,随时密切关注文风问题,应该像卫生防疫部门随时监测预防时疫流行一样,一旦出现不良文风,就立刻敲响警钟,决不任其蔓延传播。其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不良文风就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精神病毒,从某种意义上看,它的危害远远超过病疫流行。病疫流行,易于察觉,而不良文风对社会造成的精神污染,往往被人忽视。人们看到病疫流行,还能自觉避而远之,唯恐感染,而对于不良文风,人们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它的影响,以至形成气候,收拾起来,颇费周折。这样的教训应该吸取。

文风的演变,要受历史的和现实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政治思想对文风的决定和制约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政治气候影响文风,文风反映政治气候,并对政治有一定的反作用。倡导什么文风,反对什么文风,常常与政治动向有关,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看,就直接关系党风、政风、学风和社会风气的建设,即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回顾延安整风以来,文风的种种表现,无不与各个时期政治形势相关。分析认识文风演变与政治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自觉地注意政治的导向作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良好的思想作风,对于端正文风具有积极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同志曾经把端正文风,作为关系革命事业成败的大事来对待。毛泽东对文风问题,不仅有精辟的理论建树,而且以其丰富的写作实践,撰写了“为民立极”的“雄文四卷”,树立了革命文风的典范。学习毛泽东著作,研究毛泽东文风理论,总结文风演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我们今天大力提倡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必不可少的课题。

毛泽东的文风理论及其写作实践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原则,从政治和哲学的高度论文风,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党性特点;

第二,它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优良文风,具有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表现了突出的民族性特点;

第三,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是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解放的斗争服务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毛泽东的文风理论和创造性的写作实践是完全一致的,三个特点有机地统一体现在毛泽东

的著作中。毛泽东的文风长期以来影响广泛而巨大。毛泽东五十年前在延安整风时倡导的文风，就是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倡导的文风，最重要的是学习它的根本精神。毛泽东的写作有明确的目的，它围绕一个主旨，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就是毛泽东文风的根本精神。文章是客观事物的书面反映，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就必须具有这样的根本精神。从这一根本精神出发，毛泽东对撰写文章提出了三项要求，从而概括出了优良文风的基本特征。他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文章是否具有这三种性质，其实就是判断文风优劣的三条标准。

从《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文章编排的顺序来看，毛泽东第一次谈到文风的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这篇文章在论述学习的重要性时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他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指导革命运动必须理论结合实际的道理。紧接着就讲了文风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问道：“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上论述表明，毛泽东并不是一般地就写作问题谈论文风，而是把文风问题与指导伟大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谈的，是从文风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关系这样的原则高度来谈的，是从革命实践经验中概括出来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历了第一、第二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处在抗日战争初期的艰难时刻，现实严酷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思想斗争，使中国共产党人从实践中获得了深刻而丰富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就成功的经验而言，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指导，分析研究中国革命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撰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二十多篇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理论、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根据地建设、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具有纲领性指导性的文献，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前途的问题；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的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的问题等关系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毛泽东的写作实践，为逐渐形成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开创了道路，树立了优良文风的榜样。另一方面，从失败的教训来看，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冒险主义，悲观主义，

投降主义,速胜论、亡国论等等,一次又一次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破坏损失和消极不良影响,使全党逐渐认识到,无论政治、军事、思想斗争,都需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的指导,方能立于不败之地。为此,就必须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缺乏对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全面的规律性的认识,就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战略策略。这就是说,“左”、右倾机会主义等之所以必然失败,就其思想路线而言,是犯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而这一点,正是不良文风产生的思想根源。

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作到全党行动一致,首先需要思想认识一致。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革命队伍中存在的错误思想理论作斗争,扫清思想认识上的障碍。端正文风的问题,就是属于思想理论斗争的问题。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其表现形式党八股是认识上的大敌。大敌当前,决不容许等闲视之。因此,即使当时处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斗争阶段,也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展全党整风运动。毛泽东为此专门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等文章,作为指导延安整风的主要文献。主旨一个:“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党的作风》)

毛泽东概述了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风演变的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的向右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的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東西”(《反对党八股》)。毛泽东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大声疾呼,动员全党声讨“党八股”,列举其八条罪状,作为声讨“檄文”。

党八股的八条罪状:第一,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第三,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第四,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第五,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第六,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七,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据此,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就可以向前推进了。”(同上)毛泽东还指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它的表现极为广泛,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开会、发言、学习讨论等等都有党八股的表现。

延安整风对党八股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清算,正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通过延安整风,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水平大大地提高了,端正了党风。新的文风获得了充实和普遍发展,出现了大量的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整个革命事业大步向前推进,不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乘胜挺进,迅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建国以后,毛泽东倡导的文风得到进一步发扬,但也受到三次严重的干扰。“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文化大革命”中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改革开放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带来严重破坏。三次干扰,每次的问题各不相同,但不同之中有共同之处,这就是思

想路线上非常突出地表现出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这三次干扰,可以吸取教训。

第一次对文风的不良影响,来自五十年代后期“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本来,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仅仅从想当然的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就提出一些缺乏根据的口号指标,如号召短期内赶超欧美发达国家,要求“粮食亩产上万斤”等等,似乎只要有了革命干劲,就可以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这就严重地违背了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结合的原则。而缺乏科学精神的所谓“革命干劲”,就必然表现为盲目冒进的狂热、冲动。不仅是欲速不达,而且造成极大破坏。有人为了达到这种想象中的计划指标,竟异想天开地强制推行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又不愿正视这无情的现实,于是弄虚作假,也要编造出所谓“人间奇迹”,堂而皇之地宣称“亩产稻谷几万斤”,还要组织人们参观学习,接受启发,推广这“坐火箭、放卫星”的“示范样板田”的“经验”。由于有了“高产的根据”,就有“理论家”概括出高妙的“理论”,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这样一来,大话、空话、假话、漂亮话、套话便成了“敢想敢干”的“豪言壮语”,而真话、实话则被视为“右倾保守”。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建立,不顾农民觉悟,不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夸大“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在条件并未充分具备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向前过渡,大搞“一平二调”。这样就严重地挫伤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高涨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这分明是个人意志的产物,却被“理论家”整整有词地说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上述这类浮夸不实之词,在“大跃进”的一段时间里,大量地表现在演说、讲话、报告、通讯、文章、诗歌之中。人们从中看到的只是片面夸大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看不到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精神。这样的文风当然不是优良的文风。后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调求实精神,才使这猛刮一时的浮夸风,有所克服,有所收敛。

第二次对文风的恶劣影响,来自“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既鼓吹现代迷信,又煽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妖风。本来,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修防变,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道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维护党的领导,应该具有的态度。可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却别有用心地对此加以歪曲,肆意鼓吹盲从迷信,煽动宗教似的狂热,搞偶像似的崇拜,塑造神样的绝对权威。说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形成“凡是”禁区,唯上唯书而不唯实,这是形而上学的绝对肯定的极端;另一方面,又竭力煽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这又是形而上学的绝对否定的极端。打着红旗反红旗,高喊革命反革命。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以所谓反对“封、资、修”的口号为幌子,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主观武断地确立所谓贯穿古今的儒法斗争,区分革新、保守,进步、反动,把它作为判断一切的是非标准;对优秀的历史文化横加否定,而对腐朽透顶的封建糟粕却奉为瑰宝,大为吹嘘;在组织问题上,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打倒走资派”为名,采取捕风捉影,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任意罗列“罪证”的手段,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以所谓“政治斗争就是一切”为理由,使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遭受严重破坏,竟然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造成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这样的情况,表现在文风中,还可能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吗?

第三次对文风的严重破坏,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造成的。打倒“四人帮”,结束“文革”,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全国掀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论辩,批判唯心论形而上学,冲破“凡是”理论禁区。这一切,对于

重新端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澄清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扫清思想障碍，为贯彻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路线开辟了道路。可是，就在这健康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却又出现种种干扰。有人在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更新观念”的幌子下，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其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企图把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引向屈从于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来势凶猛、愈演愈烈。从提出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和反动的观点，到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里，都形成一套相当完整的体系；从以理论学术形态出现，到直接公开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鼓吹全盘西化；从对现实的否定、到否定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到否定我们党近七十年的历史，一直到否定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否定整个中华民族；从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到露骨地宣扬卖国主义、崇洋媚外，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已构成系统的理论：即经济上私有化，政治上多元化，思想上自由化，伦理道德上自私化，文艺上腐朽化。种种观点通过座谈、讨论、演说、讲课、文章、著作、影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广为散布，从而形成了一股恶劣的文风。其特点是用所谓“新理论”、“新观念”、“新概念”、“新术语”，标榜其思维玄妙高深，实则借此制造思想混乱；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和现实，而是狂妄霸道地任意阉割历史、歪曲现实；用片言只语，断章取义、信口开河，为我所用等手法，论证其所谓“理论”。

这股猖狂一时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流毒深广，清算其在文风上的恶劣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大事。

延安整风以来，五十年间文风经历了曲折演变。我们深感文风问题决不只是写作技巧问题。优良文风的形成，要靠正确的政治思想导向。在我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是正确的政治思想导向。这一点，无论何时都应牢记不忘，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做到以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科学态度对待写作，才能有效地尽量避免以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唯上唯书的态度对待写作。这是清除不良文风的根本之道。为此，我们要永远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

我们还要记住，优良文风同不良文风，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要提倡优良文风、反对不良文风，就要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历史教训再次发生。在写作这块众芳争艳的园地里，人们期待百花盛开，但不能指望不长出一点杂草。鲜花要靠人们去培育，杂草也要靠人们去铲除。

我们坚信，只要遵循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准确、鲜明、生动的优良文风要求，写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就能为促进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发挥出它应有的重大作用。